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国际政治

编者按： 7月21日，日本公布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海洋问题”，并称“海洋问题”事关日本生死。安倍政府执政以来，日本不断强化其自身所谓“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试图成为海洋大国，其海洋安全战略的扩张主义、现实主义色彩日趋浓厚，已经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及地区海洋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

新时期日本海洋战略与对华政策

□ 吕耀东 王惠波

伴随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世界海洋权益纠纷日益激烈，日本强化自身所谓“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努力成为海洋大国，为此形成了新时期的综合海洋战略观及战略构想。安倍上台以来，日本的海洋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海洋安全战略的扩张主义、现实主义色彩日趋浓厚，已经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及地区海洋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日本提出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的战略构想，与日本走向“正常国家化”，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直接关联，是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海洋战略构想是力求通过保护所谓本土安全、海上通道及经济安全，谋求政治与军事大国化，并与美国以同盟机制掌控西太平洋海权利益。同时，日本始终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妄言中国海洋维权活动是以“武力”改变现状，通过价值观外交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制造所谓“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对立，表现出日本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以日美同盟为依托干涉中国合法的海洋活动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的海洋战略防范对象一直以中国为主。日本视中国为“大陆国家”，与自身“海洋国家”的身份为敌，认为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又极力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日本一些政治家以此为口实，强调与美国等“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加强结盟关系，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一直以来，日本的海洋派在外交中占主导地位，他们在强调日美协调的背景下，敌视与防范中国。现在，对于日本的海洋派来说，他们所面临大陆国家的挑战，主要是来自日益崛起的中国。近年来，日本以日美海权同盟为基础，同时不断联合个别亚太国家，进行海洋安全战略合作，其目的就在于压制中国在海洋方向上的战略发展。日本不但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封堵，而且也不断加强自身对海洋的控制。

日本将钓鱼岛作为其海权图谋的切入点，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无非是想得到美国关于两国同盟针对中国的积极回应，希望得到美国总统亲口道出“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安全承诺。安倍充分利用奥巴马2014年4月访日的时机，力主促成针对钓鱼岛的日美共同声明，以日美军事同盟遏制中国海洋维权。美日《共同声明》中就“钓鱼岛问题”宣称：美国在日本进行了最新锐的军事部署，并且为履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中的各项承诺提供了全面保障。这样的承诺也适用于包括尖阁诸岛（即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内的、日本施政下的所有领域。这就意味着美国反对针对尖阁诸岛有任何损害日本施政的单方面行动。日美两国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炒作“钓鱼岛问题”，破坏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日美《共同声明》以所谓“海洋国家”的身份要求中国必须遵守它们划定的所谓“国际规则”，严重干涉中国主权范围内的正当海洋维权活动，暴露出了日美同盟的“强权政治”及霸权主义的本质。

以钓鱼岛及东海问题挤压中国的海洋维权空间

钓鱼岛领土主权与东海海洋权益等问题是困扰中日关系的现实症结。安倍上台以来，竭力使“钓鱼岛问题”成为巩固日美同盟的重要议题之一。在2013年的《外交蓝皮书》中，日本刻意渲染自身安全环境日趋严峻，直接或间接地强化“中国威胁论”。强调日本的领海、领土和领空“正面临着更多的威胁”，诬称中国对钓鱼岛的正当维权巡航是日本直接面临的安全问题。2014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更是肆意抹黑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正当性，无理指责中方“试图强行改变现状”，并肆意抹黑中国在钓鱼岛及附近海域的正当维权活动，遏制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日本政府为了巩固钓鱼岛非法“国有化”的成果，不断调整西南诸岛军力部署，增强海上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及舰艇的数量和海巡力度。开展全方位国际海洋安全合作，竭力同所有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谋求“集体自卫权”，以此遏制中国正当海洋维权，力求营造有利于日本海洋战略的国际环境。

以“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构想遏制中国海洋崛起

日本深化日美海权同盟关系的同时，力求纠集具有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构筑海洋合作伙伴联盟，将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国际影响力从西太平洋扩展至广大的“印太”海域，最终建立起一套海洋综合安全保障体系。为此，安倍提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构想，设想由澳印日美组成“保卫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公海”的菱形态势。日本将继续保持与美结盟的外交基轴，以海洋联盟的合作体制立足东亚，从而引导亚洲。

日本有些海权理念把中国作为“大陆国家”排除在其圈定的“海洋亚洲”之外，力图从理论上剥夺中国走向海洋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与中国争夺亚洲大陆外围海权。日本执政的保守政党及保守势力力图塑造“海洋民主国家”及维护国际秩序的“海洋大国”全新形象，为此，积极在亚太地区构建“泛海洋国家联盟”和“民主国家联盟”，力图以“价值观外交”拉拢印、澳、韩、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太平洋岛国，企图遏制中国维护海洋主权权益。“价值观外交”已成为日本实现从“岛国到海洋国家”战略构想的重要手段。2014年7月8日，安倍访问澳大利亚并在澳议会发表演讲，表明加强日澳海洋安全合作的针对性。试图通过强调日澳两国间的“特别关系”来制衡中国的正当海洋维权活动。安倍曾在2013年初访问东盟个别国家时，发表了对东盟外交的五项原则，其中大有离间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嫌疑。日本力图在日美同盟机制框架下，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韩国、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安全合作，以多边形式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借此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印太海域国家间关系，既涉及国家间的海洋安全合作，也有在东亚区域合作中谋求经济利益的目的，还有牵制中国正当海洋维权的战略意图。

可以说，日本已经突破保卫传统海上通道的安全观念，将掌控“印太”广大海域作为日本海洋战略的侧重点。日本依托日美海权同盟，力图引导亚太地区海洋安全合作进程，希望构建以日本为主导的“海洋安全联盟”来牵制中国正当的海洋维权活动。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仍会以自由、民主及人权等价值观作为“印太”海洋安全合作的根本基础，谋求通过构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和“海洋安全伙伴联盟”，离间印太区域内国家间关系，制造印太海域不安定局面。

结 语

日本海洋战略的长远目标是通过保护本土安全和经济安全，奠定政治与军事大国的基础，与美国共享西太平洋海权。2012年的日本政府非法实施钓鱼岛“国有化”行为，就是日本实施海洋战略的第一步。钓鱼岛问题已演化为日本对华“价值观外交”“环绕外交”和“俯瞰地球仪外交”攻势。安倍积极推行保守主义外交路线，注重日本同盟关系和战略性亚洲外交，并已成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遏制中国的“价值观”利器。这一系列外交动作就是重拾“自由繁荣之弧”策略，孤立包围中国、制造“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对立，渲染“中国威胁论”，形成对中国领土主权及海洋维权的严重挑战。可以说，日本海洋战略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台海局势、南海问题、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海洋权益维护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大局和东亚地区安全环境。

从“伊斯兰国”看恐怖主义背后的宗教诉求

“伊斯兰国”与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宗教诉求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们正在用国家的形式实施复古性统治，而这些“伊斯兰国”宗教信条的推广和拓展方式又借助了世界上最新现代化的通讯技术手段。

□ 周 戎

6月27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africa metro网站上宣布，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而他将成为这个帝国的哈里发，并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向他效忠。为了建立一个伊斯兰统治的世界，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开出了一个长长的“黑名单”，向印度、中国、巴勒斯坦（以色列）、索马里、阿拉伯半岛、高加索、深水（地中海东部）、菲律宾、阿瓦士、伊朗、埃及、伊拉克、印尼、阿富汗、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宣战，因为“穆斯林利益在上述国家和地区受到了侵犯”。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并非乌合之众

200余份从伊拉克战场缴获的文件资料显示该组织运作模式与现代公司非常相像，拥有自上而下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它的管理人员对组织运营均有详细记录，包括每个武装分子有几个配偶和子女、一旦被俘或阵亡可获得多少补偿、执行自杀式攻击的成本开销等。资料表明该组织具有极强的自我恢复能力，每次在军事上被美伊联军重创后，都能在短期内恢复重组。不仅如此，该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自我监督和反省意识，一名“伊斯兰国”“高管”认为，组织内部缺乏监督机制容易造成腐败，因而要求巴格达迪重组“伊斯兰国”管理层。美国兰德公司等智库分析认为，由于“伊斯兰国”对完善组织架构和细节高度重视，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恐战争，该组织仍像“打不死的小强”，美国情报机构过去关于其已被击溃甚至几近消亡的判断是错误的。

“伊斯兰国”并非“基地”组织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都属于一个叫萨拉菲（源自阿拉伯语，即“虔诚的先驱们”）的逊尼教派的圣战分支。“基地”组织通常喜欢有计划地制定并逐步实现战略目标，而“伊斯兰国”则喜欢不计代价快速扩张。有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青年圣战分子更倾向于“伊斯兰国”的激进理念。联合国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谴责是：蓄意杀害和攻击平民；枪决和处决士兵；迫害少数族群；攻击学校和医院；毁坏文化和宗教场所。其中后三项，“基地”组织基本上是不做的。

人们对“伊斯兰国”理念有很多误解。例如，人们以为伊斯兰圣战只有一种类型，所以把基地组织的逻辑也套用在“伊斯兰国”身上，其实这个组织远超基地之上。“伊斯兰国”支持者依然尊称奥萨马·本·拉登为“奥萨马酋长”，但“伊斯兰国”圣战斗士看不起基地组织领导层及其战略部署。本·拉登把自己的恐怖活动视为建立哈里发国家的前奏，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个国家。他的组织由分散在各地联成网络的自治小组构成。而“伊斯兰国”要求拥有疆域维持其合法性，统治国家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结构。（它的行政机构分为行政和军事两部分，疆域也分为不同省份。）几乎所有“伊斯兰国”的决策都遵循它自己声称的，被广泛公布在其宣传板、车牌和硬币上的“先知方式”。

与“基地”组织不同，“伊斯兰国”有一套治理理念，以及分五步走的建国路线图。从游击战对抗（Hijrah）开始，经过集合各方力量多点出击（Jama’ah），再到对异见统治者（包括穆尔西、阿萨德等不受ISIS认同的穆斯林领导人）治理区域的破坏活动（Destabilize Taghut），吸纳统合各地反抗力量（Tamkin），直至最后建成哈里发国（Khilafah）。

“伊斯兰国”对圣战思想的歪曲

“圣战”一词可在《古兰经》中找到依据，一些著名思想家如伊本·泰米叶、沙特的瓦哈布等等都有过“圣战”思想。当今世界，“圣战”口号频出，以“圣战”为名的组织层出不穷，而打着圣战旗号的各类活动也是连续不断。伊斯兰圣战已经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征，它不仅是征服、扩张的代名词，也是反抗邪恶的同义词。在当前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圣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处于弱势群体的世界穆斯林对当前困境的一种反抗，但同时也被怀有极端恐怖思想的“伊斯兰国”用于其大规模的恐怖和军事扩张行动。在“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解释下，非理性的狂热和为主殉道的思想被煽动起来，“圣”的意义只剩下外壳，“战”的意义被凸显起来，以忠实宗教信徒从事自杀性恐怖袭击活动，就是“伊斯兰国”所推崇的圣战。

“伊斯兰国”所谓“圣战”，针对的并不只是非穆斯林人群。“阿拉伯之春”后，圣战思想再度流行，“伊斯兰国”经常以宗教的名义指责别人不是穆斯林，伊拉克政府军绝大多数属于什叶派，相当一部分逊尼派认为什叶派不是穆斯林，在他们与“伊斯兰国”作战后，被抓住后“伊斯兰国”士兵立即将他们处决，对“伊斯兰国”来说，绝大多数被杀者都是非穆斯林。去年7月，“伊斯兰国”“圣战斗士”炸毁了一座约拿的清真寺，约拿是伊斯兰教的先知之一。什叶派清真寺里有敬仰的宗教人士的墓，在什叶派看来，这不是崇拜这个人本身，但是在瓦哈比派、巴格达迪看来，清真寺是真主的地方，而真主的形象是不可见的，这种行为已不是穆斯林了。就像穆兄会思想家所说，现在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世界就像先知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教前蒙昧状态，必须发动“圣战”，重走先知曾经走过的道路就是“伊斯兰国”的极端思想。

“伊斯兰国”背后的宗教诉求

严格地说，“伊斯兰国”的宗教信条远远不同于基地组织和其他一切伊斯兰宗教组织，它要建立一种排他的、复古的、一切按照他们理解的可兰经信条统治世界。“伊斯兰国”与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宗教诉求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们正在用国家的形式实施复古性统治，而这些“伊斯兰国”宗教信条的推广和拓展方式又借助了世界上最新现代化的通讯技术手段。

“伊斯兰国”的宗教信条认为必须靠屠杀宗教异端分子净化世界。其社交媒体帖子显示处决的个案此起彼伏，每隔几个星期，就有大规模处决的案例。“伊斯兰国”各阶层都融入了宗教的活力，随处可见对古兰经机械的引用。在“伊斯兰国”的政治宣传当中，叙利亚是发动最终大决战的地方。这种以阿拉伯为中心的世界想象，实际上构造出了一个明确的等级差序世界观。虽然他们也会借助伊斯兰的大同想象——“乌玛”，但他们设想的乌玛不是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乌玛，而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世界帝国霸权。

与“伊斯兰国”对垒的是整个世界

尽管“伊斯兰国”声势浩大，而且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强大的敛财、招募能力，有辉煌的军事战果和可持续的作战能力，但其对抗的是整个文明世界。包括基督教世界、佛教世界、印度教世界在内的所有的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都与之对抗。不仅如此，就是在伊斯兰教内部，“伊斯兰国”力量也处在绝对劣势。在全世界12亿多穆斯林人口中，至少有2亿什叶派穆斯林被认为是“伊斯兰国”的死敌。而在10亿多逊尼派穆斯林当中，又分有南亚教派和阿拉伯教派，南亚4亿多逊尼派穆斯林都不是“伊斯兰国”所推进的瓦哈比教派和萨拉菲教派，而是德奥班迪教派与布拉维教派，“伊斯兰国”在宗教上不具备兼并其他教派的能力。即使在瓦哈比和萨拉菲教派的内部，赞同“伊斯兰国”的主张的人也占极少数，因此如果不是强制皈依，“伊斯兰国”在宗教上缺乏穆斯林世界的广泛认同，除去政治、军事、经济等因素，其在宗教力量对比上也处于劣势。

目前反对“伊斯兰国”的力量不仅包括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反恐联盟，还有伊朗倡导的什叶派、波斯语国家联盟。更重要的是，还有恐怖世界双头鹰基地组织与之抗衡，因此在宗教与世俗的对垒中，它与世界上所有的主权国家为敌；在宗教层面上，它与伊斯兰教所有的教派为敌；在恐怖世界内部，它与其老鼻祖基地组织势不两立。毋庸讳言，“伊斯兰国”在文明世界里是孤立的，没有生命力的。

热点透析

会议综述

把脉全球命运共同体

——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综述

□ 史小今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举行。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全球化趋势有了新常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致辞中表示，现在中国提出的共同体概念实际是过去双赢战略的升级版本，是参与经济全球化重要的思想基础。目前多种贸易协定、区域贸易等蓬勃发展，从长远看，如果区域贸易是开放而包容的协定，可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目前则有了新常态。国家间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和规模不断扩大，各国已经结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在谈及全球化目前的特征时说。同时他也指出，去全球化的趋势也在发展，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则在不断发酵。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对全球化治理体系的改革、补充和完善，以适应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新情况。

中国原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在发言中表示，全球化尽管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推动全球化的具体行动。他强调，“走出去”的过程中，要警惕封闭的观念。“中国应重视外来的威胁，但不宜过分夸大，而应实事求是地估计。夸大外部威胁容易促成封闭的倾向，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于外因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强调了制度设计的重要性：“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跟建设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中国全球化对国际崛起有其潜力，但最终能否把潜力转化为实际的结果，还得取决于国内制度的建设，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进行。”

中国企业国际化正是最佳时机

与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代表们认为，企业成功走出去需要把好五个关：标准关、文化关、社会责任关、品牌关或信誉关、环保关。

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才刚刚开始，而且现在正是好的时候。“中国品牌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加。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模仿速度很快。只是随着模仿者不断增多，它们不是和国外被模仿者竞争，而是要与国内其他模仿者相互竞争。很有意思的结果是，充分竞争之后反而出现一些美国或国外所没有的创新。”

人才是国际化关键要素

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人才流动的全球化。但是与会嘉宾都指出了中国目前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不足。

“提高对全球治理的参与水平，就要提高参与者的素质，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何亚非指出，“全球化在新常态下的竞争，说到底就是规则竞争、人才竞争。我们需要一大批在各领域精通国际规则、精于国际谈判的人才。”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在全世界很低，只有0.06%，而目前发达国家的国际人口比例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为1.6%。留学生也是类似局面，外国留学生在中国读学位的比例现在是0.5%，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都是10%。他举例说，香港科技大学85%的教授来自世界各地，“未来我们的创新需要广纳天下英才”。

“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南亚的留学生，但欧洲和美国来的留学生还是不够。”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认为，要建立吸引这些留学生到中国的机制。在他看来，现在中国学校的人才资助完全跟世界名校脱节，中国的大学学府没有能让美国的学生和教授能够长期留下来的社会环境，比如医疗制度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